

根治雾霾的根本途径在于成为发达国家吗？

——对林毅夫先生一篇文章的疑问与思考

刘元玲 文佳筠¹

摘要：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雾霾成因根源于三个因素——经济发展阶段、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环境执法不严；而根治雾霾的关键在于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国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然而，个别地区因环保引发的发展问题凸显了快速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同时，巴西、阿根廷、希腊等国的现实也说明，服务业发达并非进入或者保持发达国家地位的灵丹妙药。对于问题的成因和应对方法，林先生的论述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失于简单化，没有对其中所涉及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面向和思考。

对林毅夫先生《根治雾霾要赶快成为发达国家》一文的几点疑问

2015年3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在发言中论述了经济发展与雾霾之间的关系。随后在5月5日，林先生的一篇短文《根治雾霾要赶快成为发达国家》在网上发表，并引发多家媒体转载。

文中核心观点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除了执法以及多使用清洁能源，釜底抽薪的办法，是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²也就是说，林先生认为若想彻底根治雾霾，就要快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即标题中所称的“要赶快成为发达国家”。

此观点一出，引发很多关注。林先生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一直以来，作为学界晚辈，笔者从他的著作、演讲中学习很多并颇受鼓舞，也对他非同凡响的人生经历怀有敬意。然而，关于这篇文章在雾霾及环境恶化的原因和应对方法的论述上，笔者有一些疑惑。

其一，治霾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等号能轻易划出来吗？

这篇短文题目只点了雾霾，但整个文章却把雾霾和环境污染并列。我们知道，雾霾作为一种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部分，二者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无论从起因还是从应对方法上，二者具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将其等同视之。即便如题目所言，重点分析雾霾，那么根治雾霾就是要赶快成为发达国家吗？

当前，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经济合

¹ 刘元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佳筠，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² 林毅夫，“根治雾霾要赶快成为发达国家”，<http://mt.sohu.com/20150505/n412413797.shtml>

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的界定，发达国家的数量在30个左右，而且彼此之间差异巨大。那么林先生文章所说的“发达国家”具体是什么标准呢？实际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中国具有真实可比性，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即便有，我们如何才能“赶快成为发达国家”？

综观世界，有些发达国家至今还面临雾霾与环境污染问题，2015年3月份法国巴黎的那场遮天蔽日的雾霾已经很明白地展示了这一点。当今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美国的环境优美，雾霾不多，除了技术进步，其人口密度远小于中国，环境容量大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目前人均碳排放水平远低于美国，我们如果按照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能源消耗几乎要翻番，只怕雾霾会更加严重。所以，治霾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等号恐怕是不能轻易划出来的。

其二，中国如何“快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发展阶段”？

既然要“快速进入”，那么是不是现在的速度慢了？结合林先生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按照8%的增长速度再发展20年的观点，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是慢了。然而，需要承认的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这种新常态受一系列综合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将改善环境的成本包括进去之后的增长速度。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片面追求GDP的增速带来的危害巨大，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兼顾好发展质量和速度之间的平衡，否则，硬性追求高速度恐怕会适得其反。

另外，重视和发展服务业没错，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当前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服务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现代服务业是重点发展领域。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快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比重为13%。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计算，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10.8%，占GDP的比重已从1978年23.9%上升到2011年的43.1%，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5.7%。³在国际服务贸易中，除了旅游业，我们的其他服务业还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复杂，既与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有关，也与我国目前仍旧处于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制造业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有关；既与我国缺乏现代服务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有关，也与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有关；既与国内一些环境对服务业发展造成的制约有关，也与所面临的强大外部竞争有关。显然，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期内做不到攻坚克难，那么我国服务业很难有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东三省国企大规模破产转型的过程中，也曾经有专家提出以大力发

3 程大中，“中国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及其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10期。

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方案，国家也提供了不少政策和财政支持，但收效相当不理想。为什么？因为没有工农业现代化作为基础，没有人才储备或者人力资源通过再教育转型，能够发展的服务业，不过是餐饮之类低端服务业，不过是左手啃右手，并不能创造高附加值。对我国而言，不能脱离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而空谈服务业的发展和现代化。

以美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服务业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服务业贸易进出口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受很多因素的推动和影响。其以苹果等硅谷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服务业，离不开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离不开美国的金融霸权。同时，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美国两级分化，服务业也不例外：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从全球吸取利润，确实是高收入的典型；另一方面，制造业外移固然带来了相关污染外移的好处，但产业工人阶层萎缩，大量产业工人从中产阶级跌入低收入阶层，或者失业靠救济金生活，或者从事餐饮之类低收入服务业。如果不是廉价的中国制造有效的压低了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成本，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比2008年爆发得更早。后来，美国在发达国家中领先走出了金融危机，原因固然很多，但美元霸权的转嫁功能不可忽视。建立在美元霸权上的金融服务业，其高额利润固然让人眼红，但其可复制性几乎为零。中国目前需要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服务，固然有不少需要向华尔街学习的地方，但同时更要吸取教训，不能纵容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抽血。只有植根于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在高端制造业和绿色经济方面持续不断努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才能带来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

其三：如何评价环境执法对雾霾或者环境恶化的影响？

林先生在文中指出，雾霾、环境恶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环境执法不力。这当然没错。但我们不该忘记，事实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环境执法根本就不可能严格。

原本作为预防和管理环境污染重要手段的环境执法，很长时间内本质上没有被提高到一个应有的高度。环保部门一直无法实现垂直管理，在地方经济发展诉求面前软弱无力。一方面环保法规和标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不少相关标准在快速建立的过程中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向欧美看齐甚至赶英超美，没有可执行性，造成弹性执法严重。比如对比中德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每立方米烟气排放上限，德国是二氧化硫1000毫克，氧化氮500毫克，颗粒物20毫克；中国（已有/新建/重点地区）是二氧化硫400/300/200毫克，氧化氮400/300/200毫克，颗粒物80/50/30毫克。二氧化硫和氧化氮，中国比德国严格得多。有专业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标准太严，中国绝大多数锅炉难以达标，反而会使作假成风。制定的标准比德国严格好几倍，可空气中的污染物比德国多好几倍，不是不讽刺的。这样的超高标准形同虚设，其实从建立之时就可以预测。这种种原因，造成大量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最终导致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破坏环境的事件日益猖獗。

2015年新《环保法》授予监管部门强制执行权后，我们的《环保法》才算真正长出了牙齿。然而，环保是有代价的，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近日来山东临

沂环保风暴就是很典型的一例。根据中央电视台援引《中国环境报》2015年6月25日提供的数字，“山东临沂1-5月，PM2.5下降了24.3%，PM10下降了17.3%，二氧化硫下降了36.1%，二氧化氮下降了14.8%”。这一速度全世界罕见，对比欧美相关污染物减排的历史数据，临沂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实现了许多发达国家用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够完成的环保目标。然而这种环保大跃进的代价也相当巨大。临沂市长2015年2月被环保部约谈后5天之内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如今，企业因无环评手续不能复产，资金链断裂，引发千亿债务危机。当地产业界人士估计直接失业人口6万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6月6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治理环境污染要着急，但不能太急，简单的关停涉污企业不利于环保，环境优先不是舍弃GDP。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中高端的工业化发展中，通过做经济加法而不是做减法，为环保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撑，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简单的关停不但无益于企业转型升级，还对环保的两大基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阻碍作用。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工业化，其中有一部分是牺牲环境换来的。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已发展，该治理”的阶段，环保执法的加强是国家和民众共同的诉求，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不再单纯追求高GDP增长，而是要追求有质量的GDP增长。如何最大限度地统筹环境与发展，将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大挑战和机遇。

林先生的这篇文章一方面强调GDP增长要继续高歌猛进以快速成为发达国家，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环保执法，却对两者之间的张力视而不见，未免失于简单化。

余论：人的因素对雾霾和环境恶化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人的因素对雾霾和环境恶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和人心。一方面，仅就人口数量来说，在过去几十年我国进行的工业化进程，相当于大约两个欧洲、四个美国在同时进行工业化发展，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十几亿人口的吃穿住用行带来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和大气污染是非常巨大的，这是考虑我国雾霾或者环境污染成因的一个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心灵的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深刻且不容忽视的原因。“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一旦一种特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成为了某种文明或者文化的内核，它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该社会每个成员社会化过程中的路标。⁴从而，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均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就我国而言，在过去几十年内，重视经济发展而无视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利润至上而任由道德水平滑坡已经引发了

4 R.D. Putman,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1.

大量的问题，对环境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现实中有很多体现，记得2007年当记者就太湖污染事件采访当地一家污染企业的负责人时问他：“太湖是你的家乡，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你们把它污染成这样，将来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等我赚够了钱，我就打算移民加拿大。”这种认知是不是可怕又可恨？！人心若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局部污染的治理只怕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治理污染的方面，必须要同时关注人们心灵家园的建设。

进一步讲，我们的自私和贪婪导致对物质世界的过度追求，从而造成了大量能源资源的消耗和污染。如何管理我们的欲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毫无疑问，这种自私和贪婪的心灵问题，存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一方面它植根于我们自身的人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于制度设计上生态视角长期缺失，政策层面一直鼓励破坏性增长，知识层面对全社会长期缺乏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国情知识普及。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它还产生于极度的欲望膨胀。欲望膨胀既有内生的一面，也有输入性的一面，输入性的欲望膨胀恰恰也是来自林先生所说的发达国家，来自我们对所谓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渴慕和追逐。然而，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给全球带来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占用了大量的发展空间。他们自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方式”给整个地球家园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污染，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其中最为极端的，莫过于美国。同为发达国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是欧盟或者日本人的两倍以上。这是和房子越大越好、车子也越大越好的消费主义美国梦及其密切相关的高碳高资源发展模式分不开的。

中国经过30年高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石油进口大国，雾霾也越来越严重，北京等城市拥堵普遍。继续盲目照搬美国模式难以为继，需要从价值观等多方面加以反思。正如丁仲礼院士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提到的：气候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地球用不着我们拯救，地球自身经历的波澜壮阔的起伏变化甚至是人类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她依然存在。既然人类要拯救自己，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和器物层面，还应该深入到精神和心灵层面。